

【特稿】

# 张仲实与周恩来交往若干史实考略

张积玉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西安 710119)

**摘要:**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与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交往时间达半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无论是张仲实在莫斯科留学期间聆听周恩来传达党的六大精神,还是抗战时期张仲实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访问周恩来、引荐邹韬奋面见周恩来以及在专著中征引周恩来有关抗战形势的分析;也无论是周恩来精心安排张仲实和茅盾脱险新疆、随同朱总司令车队去延安,还是周恩来亲自主持并安排张仲实具体负责纪念和追悼邹韬奋先生的筹备工作,以及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百忙中复信张仲实家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邀请张仲实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有关问题座谈会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周恩来真诚关心、热情帮助和积极促进一代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历程,以及与革命知识分子之间始终保持的良师益友关系,由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一贯尊重知识、重视知识分子和爱护人才的优良传统。

**关键词:**张仲实;周恩来;交往史实考;中共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22)06-0005-12

**收稿日期:**2022-03-10

**基金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张仲实文集(十二卷本)”(基金办[2014]1号)阶段性成果之一;陕西省社会科学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课题:“张仲实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2020DS013)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积玉,男,陕西陇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部数字出版协同创新中心咨询委员会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编辑出版研究。

1990年,笔者曾在《延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过一篇题为《抗战时期张仲实与周恩来往来若干史实》的文章,该文对抗战初期张仲实在武汉引荐邹韬奋面见周恩来、抗战中期周恩来安排张仲实和茅盾赴延安、延安时期周恩来指定张仲实具体负责纪念和追悼邹韬奋先生的筹备工作、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复信张仲实家人等史实,做了初步考查梳理,但只涉及抗战时期一个时段,对其前后的相关史实均未涉猎,且论述简括尚缺乏全面性,因而存在不少缺憾。该文发表30多年来,笔者在不断学习研究尤其是在整理、编辑《张仲实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出版)以及编著其年谱的过程中,不断发现了一些新资料,掌握了有关新的史实,深化了对张仲实与周恩来两人交往的认识。深感一个理论工作者与党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周恩来对张仲实等一代知识分子的真诚关心爱护和倾心帮助的点点滴滴,都生动地诠释着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百年中一贯坚守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和爱护人才的优良传统,而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大业中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为进一步深入发掘、整理前人未曾注意的史实,细化、深化周恩来及张仲实生平思想研究,进而更好地学习、研究、继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本文拟对张仲实和周恩来两人半个世纪以来交往的史实做一较为全面的考述,以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某些参考。

## 一、张仲实留苏期间聆听周恩来讲演及两人的相识

1937年12月31日出版的《抗战》(三日刊)第32期,发表了张仲实同年12月27日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及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的访谈录——《与周陈秦三位先生谈话记略》一文。张仲实在该文中写道:“恩来先生精明干练……我在十年前曾听过他的讲演,把他现在的谈话和过去讲演一比较,内容更觉丰富而充满热情了。我们见面之后,大家都没有说一句客气话,就亲热地谈起来。”<sup>[1]</sup>此处所说十年前听过周恩来讲演的史实是,1928年八九月张仲实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听周恩来给留苏学员传达党的六大精神的报告。

1926年10月,张仲实经党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1928年5月,东方大学中国班撤销、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他被安排在张闻天领导的中山大学翻译班工作,主要参与翻译马列著作及理论教材。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周恩来与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向忠发、蔡和森、项英、王若飞、叶挺、刘伯承等84名正式代表、34名候补代表出席会议。会议主题是: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周恩来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瞿秋白致开幕词,并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围绕两个报告,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及任务、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重申中国革命的性质,分析了某些同志混淆革命性质的原因,提醒大家注意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并于6月30日及7月3日分别作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及军事报告,7月11日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在本次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本次全会后,周恩来和瞿秋白等人未立即回国,随后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周恩来“他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看在哪里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同志,向他们讲六大精神和国内形势,询问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希望他们学成回国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sup>[2]184-193</sup>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期间,张仲实正好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因此,就听了周恩来在中山大学所讲的《六大精神和国内形势》。关于周恩来向中国留学生党员传达中共六大精神的情况,时在苏联工程兵学校学习的师哲曾回忆他在孔策沃高级射击学校听周恩来演讲的具体情况:“8月12日的下午,恩来同志到孔策沃给党员学员作了关于六大的传达报告……恩来的报告从晚上七点开始,一直讲到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他详细地传达了六大的精神,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革命转变等问题。我们当时最关心的是革命的性质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争论最大。……他说,六大明确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根本的任务是完成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工运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使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殖民地地位,使民族获得解放和独立等等。……接着,他介绍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特别分析了国内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现状。同时,也给我们做了指示,并回答、解释了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sup>[3]25-26</sup>在六大会议期间,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李振瀛等党的负责人也到中山大学向全体中国留学生作过报告<sup>[3]25</sup>。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以及周恩来等党的负责人对留学生所作的传达报告,对张仲实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张仲实次子张复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询的父亲档案,张仲实留苏期间,曾多次用俄文和中文向学校写信申请转学军事(见图1)。1928年4月,张仲实在写给中山大学党的支部局的信<sup>[4]</sup>中说:

党的支部局:

关于我要求转学军事一事,我还有以下意见:

在今年四月间在东方大学时,我即向党部和教务处坚决请求在下半年我要转往军事政治学校,当时党的书记和教务长曾口头面允;自东大中国同志合并过来后,在本月二十日有东大

转过来的同志的大会上,学校秘书(名字忘记)曾询问在东大要求过要学习军事的同志,我当时举手报名,但未指出我究往何种学校比较适宜。此地关于军事对中国同志的重要和我学军事的志愿,恕不说及。现当党部还未决定前,预先应说明的,即尽可能的允许我下半年转往军事学校并且是军政政治学校……

我希望党部能完满地允许我的要求!并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克里温(俄文)(学号 968)

1928年

克里温是张仲实留学苏联期间的俄文名字。张仲实作为在苏联留学生中俄文和理论学习成绩都突出的学员,之所以一再强烈申请转学军事,是与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及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密切相关的。张仲实 1926 年 10 月赴苏留学不到一年,国内便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之后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这两件大事使在苏联留学的许多中国学生受到很大震动;留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普遍认识到学习军事和回国后参加军事斗争的重要性。1928 年,张仲实在写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中亦说道:“目前,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最高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重大任务是武装工人和农民直接去夺取政权。因此,如果我们现在回到中国去,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主要任务和党的工作就是要实际地武装工农,并认真地准备起义。因此我要求党现在就让我转到军事学校去学习军事。”1928 年 4 月 25 日他在写给特别班党委会的“申请书”里亦讲到同样的意思:他希望学习军事“是完全出于党的利益,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任务是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直接夺取政权。这就是说,现在我们回到中国,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军事工作。”<sup>[5]</sup>

党的六大也强调了建立革命武装——工农红军的重要性,“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斗争的方式”<sup>[6]</sup>,肯定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这也是党的六大的一个重要贡献。其中对武装斗争的重视和强调,也是影响张仲实坚持转学军事的重要原因。而莫斯科上级党组织之所以没有将张仲实调往军事院校学习,很可能是考虑到当时迫切需要他在翻译班翻译出中文版教材和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以解决留苏学员学习教材及中国国内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急需。

作为当时留苏学员和中山大学翻译班的工作人员,张仲实是否被周恩来所找参加了谈话,现尚无直接的资料。不过,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所记:周恩来 1928 年“7 月下旬—10 月初,留在莫斯科,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办理六大各项未了事宜,并向正在苏联院校学习的中共党员传达六大精神。”其中,“未了事宜”的第一项即为“审阅中国留苏学生的档案,并同留学生逐个谈话,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征询他们对回国工作的意见。”<sup>[7]</sup>既然是“同留学生逐个谈话”,那么与张仲实谈话也即是自然的事情了。另据张仲实于 1937 年所发表的《与周陈秦三位先生谈话记略》一文的描述:他们到武汉拜访周恩来时,“他很高兴热烈的,推门而入,大步地赶来和我们握手,好像多年没见面的朋友”<sup>[1]</sup>。由上周恩来和张仲实在采访过程中一言一语所表现出的热情、自然、随意、放松,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们在莫斯科曾有过直接的接触与交谈,且已相识并两人各自思想上都很清楚。

## 二、张仲实在武汉拜访周恩来等中共南方局负责人

1937 年 12 月 27 日,生活书店刚从上海转移到武汉不久。为帮助民众更好地了解、认识抗战形势,打消人们思想上的苦闷和焦虑,明了抗战前途,张仲实曾与《抗战》(三日刊)的两位同仁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拜访了周恩来及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就局势及抗战前途等问题做了访谈。张仲实曾将访谈情况写成《与周陈秦三位先生谈话记略》,在 12 月 31 日出版的《抗战》(三日刊)第 32 期刊发。三日后,张仲实又以实甫的笔名在《抗战》(三日刊)第 33 期上发表了致邹韬奋先生的信函。《与周陈秦三位先生谈话记略》简明扼要地记述了访谈周恩来及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关于时局和抗战前途等问题的意见。周恩来在回答“据周先生的观察,目前的时局究竟怎样”的问题时指出:“我们的机械不如敌人,在抗战初期,在军事上一时失利谁都可以预料得到。所以,问题还不在于我们前线怎样失利,土地失去了多少,主要的还是在于我们怎样克服目前的各种困难,继续抗战下去。在过去四个月里面,大家对于统一战线还不大相信,彼此猜忌、怀疑、抱怨,以致浪费了好多的精力。今后大家都要诚恳坦白,消释种

种误会,全力设法解决各种问题,把抗战支持下去。假使中国亡了,不仅国民党不能存在,就是共产党也不能存在。”他还说道:“应当号召很好的青年,下乡帮助政府征拔壮丁,并动员优秀的分子加入军队。只要我们在最短期间,能训练精兵六十万,我们就可以战胜敌人而有余。西班牙就是很好的教训。”<sup>[1]</sup> 1937年底,国内正处于全民团结抗战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在此特别强调了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

在谈到“舆论界”的问题时,周恩来郑重地指出:现在“流行着一种理论,是说我们现在是替苏联打,他们说,我们打败固然是日本的,就是打胜也是苏联的。这种理论是不对的,对于抗战是有害的。照这一理论说来,我们的抗战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事实是很明白的,现在领土受人侵占,人民受人残杀,文化和经济受人毁灭的,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怎么能说我们是替苏联打呢?”阐明了苏联与中国抗战的关系,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错误思想言论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评。

在整个访谈中,围绕如何解决抗战工作中存在的障碍、摩擦,抗战前途和国外援助问题,关于外蒙和苏联出兵问题等,他们还听取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的意见。

访谈从晚上七点半一直持续到十点,计两个多小时。这次访谈是经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时任中共长江局参谋处参谋长)联系安排的。最初,考虑到作为中共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周恩来工作繁忙,他们原来只想见到叶剑英,听听他的看法就可以了。不料,当他们26日见到叶剑英后,只“谈了两三句。他便说‘恩来先生昨天已经到这里,他因两宵未睡,所以现在困着休息,改一天我再约诸位同他一谈,更可多得点儿消息’”。于是,经叶剑英约好于27日晚间七点半与周恩来见的。

张仲实在《与周陈秦三位先生谈话记略》一文中,对于他们一行访谈周恩来、叶剑英等的过程做了详尽、生动的叙写。写到周恩来,说其会客室“是一间小室,地下铺着日本席子(八路军办事处以前为一日人房子),踏下去软软的,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围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面墙上,挂着两个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失地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我们原来想,先等着剑英先生,然后再由他约恩来先生来。等候了约摸五分钟,忽然一位中等身材穿着学生装的,很高兴热烈的,推门而入,大步地赶来和我们握手,好像多年没见面的朋友。这就是恩来先生。恩来先生精明干练,豪迈爽直,一望而知是个实际工作火炉中锻炼成的钢人。谈话声音响亮,锋利而诚恳,说服力很大,不论谁听了都要受其感动。”写到叶剑英,张仲实做了如下十分简而要而又精准的评价:“叶先生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民族解放的斗士。”他还特别写到了叶剑英为人的谦虚:“我们原来以为周先生很忙,不容易看到,所以没存在奢望,只想看叶先生就好了。现在听到叶先生很谦虚地不愿多谈,而要介绍我们跟周先生谈,我们都喜出望外。”<sup>[1]</sup>此次访谈及其《与周陈秦三位先生谈话记略》在《抗战》(三日刊)上的发表,及时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战形势的看法,对于帮助抗战初期广大民众正确认识时局、解除思想疑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 三、抗战期间张仲实在武汉引荐邹韬奋面见周恩来

1937年10月上海沦陷后,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张仲实随生活书店到达汉口,随即与不久前获释的生活书店的创办者、爱国七君子之一、“救国会”领导者邹韬奋会合,在武汉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此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被邀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在武汉领导我党在国统区的地下活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张仲实到武汉后,很快与党驻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委书记潘汉年取得了联系,并经其介绍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面见了董必武,还见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莫斯科的同窗博古和凯丰。张仲实每次从办事处回去后都向邹韬奋谈到我党的指示精神,邹韬奋总是认真听取并表示完全赞同和拥护,还希望面见负责同志。于是,张仲实先引荐邹韬奋面见董必武,听了董老的谈话,邹韬奋思路大开,在返回的路上郑重提出希冀面见周恩来。过去,张仲实虽见过周恩来,但尚未取得直接联系,于是把情况转告了凯丰,凯丰提出让他直接给周恩来写信。张仲实便立即给周恩来写了信,信中写道:“邹韬奋同志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关于救国道路问题,他选定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政治态

度跟党的主张没有分歧,并且总是诚恳地听取党的主张,努力使党的主张转变为他自己的实践。他很感谢我党对‘生活书店’出版刊物的支持和帮助,希望能见到周恩来同志。”<sup>[8]</sup>收到张仲实的信后,周恩来做了肯定的答复。

1938年9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会见张仲实和邹韬奋,他关切地说:“爱国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你们二人都是知识分子,有知识,又很爱国,希望我们更密切地配合起来,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一道走抗日救国的道路。……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抗日救国,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更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嘛。……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sup>[8]</sup>听了周恩来一番深情的话,张仲实顿感精神振奋,邹韬奋请求周恩来来到生活书店指导工作。此次谈话无拘无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对于邹韬奋来说,此次面叙成了他一生从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重要转折;对于生活书店来说,此后在办店方向和工作上更为直接地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指导,走上了更加坚定正确的革命道路,成为在国统区具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坚强的文化堡垒。

张仲实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周恩来同志关注着韬奋同志的事业,经常挤出时间阅读他的著作和他主办的刊物,并给予很高评价。正因为他从周恩来同志那里更多地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在许多问题上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切和帮助,所以他不但多次对我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而且还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张仲实作为生活书店总编辑,在汉口、在重庆,深切感受到周恩来对书店工作的关心、指导和帮助。他在文章中情深意切地说:“周恩来同志尊重、爱护爱国知识分子,爱国知识分子推崇、敬重周恩来同志。……我始终相信,邹韬奋同志和其他许多爱国知识分子能在白色恐怖压迫下艰苦奋斗;在敌人淫威面前毫不动摇,这其中,周恩来同志对他们的谆谆教诲,无疑起了重大作用。邹韬奋同志和其他许多文化界的同志,能够从热烈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这固然是由于他们严格的自我改造的成功,但主要的则是由于我党的影响和教育,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切和帮助。”<sup>[8]</sup>由此可见,周恩来无疑是最尊重知识、最懂知识分子、最关切和爱护知识分子的一位卓越领导人。

#### 四、张仲实撰著《国际现势读本》征引周恩来有关论述分析抗战形势

抗战期间,应生活书店负责人之一、“战时社会科学丛书”主编柳湜约请,张仲实撰写了研究抗战和国际问题的《国际现势读本》一书,由汉口生活书店1938年6月出版。关于撰写该书的目的,张仲实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伟大的,不,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把国人好像从甜蜜的梦中惊醒一样,大家的目光,不仅注视着前方与后方,并且注视着国外。一般对于国际问题的兴趣,都突然提高。报章关于国际问题的消息,杂志讨论时事问题的文字,都比以前加多;而私人友好的时事座谈会,救亡团体、学校及训练班的时事讲演,尤其活跃。中国早已是‘世界的中国’了,而且目前我们的对日寇的抗战,跟国际形势的发展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国人能把目光注视到国外,这当然是很好的一个现象。所可惜的是,有系统地分析目前国际大势和自抗战爆发以来各种国际重大问题的读物,迄今还很少看见。所以,为了适应这一需要起见,记者便不辞愚陋,毅然接受柳湜先生之约,草写了本书。”

在序中,他还特别分析指出了在抗战期间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意义:“一是为了正确地理解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检讨我们的外交政策,以保证我们军事抗战的胜利;二是为了学习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斗争的宝贵经验。”该著除著者序言外,分抗战期间研究国际问题的必要和研究的方法、资本主义世界的全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对立、现阶段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日寇的侵略与我们的抗战、从侵阿战争到西班牙战争、德帝国主义的复活、疯狂的备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威胁的逼近、国际联盟与集体安全、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等十二节展开论述。书中著者多处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列宁《帝国主义论》、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论反对派》《在联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周恩来《论抗战诸问题》和“七七事变”次日(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布的抗战宣言等有关重要论述,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战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我国抗战面临的形势,

对当时人们了解和正确认识该时期世界大势及各种重大国际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sup>[9]</sup>。

在该书第六节《日寇的侵略与我们的抗战》之“十个月来抗战的总结”中,著者对自“八一三”以降十个月来对日寇的抗战,分两个时期作了全面的总结分析,认为就军事形势发展而论,第一个时期是“八一三”起至南京失陷止,是为我军事失利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南京失陷至著者写作此书的1938年5月止,是为我军事好转时期。在分析第一时期我们军事上的失利时,张仲实特别指出:“这一失利,并不是抗战的失败,而是弱国自卫战中可能遇到的初期挫折。”在讲到这一时期我们军事上失利的原因时,张仲实引用了《周恩来论抗战诸问题》一书中的见解。

为什么我们在军事上失利呢?原因何在呢?据周恩来先生的分析,有下列几点:第一,敌人强于我们,我们的国防力量与技术条件大大落后于敌人;第二,敌人有着近四十年的准备,我们是没有的;第三,敌我经济的发展太不相称,尤其在军事工业与交通运输方面,我们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第四,敌人取得了我国汉奸、托派及亲日分子的内应,而我国在初期并没有取得敌人后方的反战运动的响应;第五,我们的军事战略与战术,太不活泼,太呆板;同时,军队的指挥,也不十分统一;第六,军队与人民还没有密切地结合起来,群众的动员和组织,都十分不够<sup>①</sup>。

张仲实认为,这一时期我们虽在军事上的失利不容讳言,但我们并不是“没有丝毫的获得”,并分析指出:“在第一时期,我们在军事上虽有若干的失利,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很大的收获”,譬如“提高了民族的自信心,粉碎了恐日病,冲破了鸦片战争以来一击即破的积弱传统”;又如“全国由分崩离析的局面转变为统一一致对外的局面”;而且“政治制度开始民主化,民众运动与组织开始进行战争的动员……我们前线战士的英勇,使日寇占领一寸土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地位,获得了全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同情”<sup>[9]117-237</sup>,等等。

张仲实的《国际现势读本》写作出版于抗战初期,在当时国际关系极其复杂、世界局势“瞬息万变”的形势下,著者对该时期国际大势和抗战爆发以来各种国际重大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阐述,对于战时广大民众了解各国状况尤其把握对外政策动向、洞悉国际大势、明确抗战的前途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国家确定和实行适宜的外交政策、利用外交活动孤立敌人、削弱侵略力量以及取得国际援助、增强抵抗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都具有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

## 五、周恩来精心安排身处危境的张仲实和茅盾脱险新疆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骑马到中央党校作报告,路过延河时因马惊坠地受重伤,右臂骨折,因在延安治疗效果不佳,8月20日党中央决定送他到苏联治疗,出行的路线是经新疆到莫斯科。8月27日,周恩来等离开延安,乘飞机在当天到达兰州。因在兰州等候苏联派专机来,于9月上旬才到达迪化。周恩来在新疆停留了三四天。其间,他听取了中共中央派驻新疆的代表邓发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的工作汇报,还同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进行了四次会谈。据《周恩来传》所述:在与盛世才的交谈中,“周恩来一面继续鼓励盛世才的进步表示,接受他对八路军、对延安的物质支援,争取同他继续合作,防止他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另一方面也对可能发生的逆转保持警惕。”<sup>[2]507-509</sup>周恩来征询了盛世才对中共中央派驻新疆工作人员的看法,摸清了他的基本态度后,随即对新疆工作做出了周密、妥善的安排。张仲实在《我的经历》中写道,1939年9月的一天,周恩来去莫斯科医治右臂途经乌鲁木齐,盛世才设晚宴欢迎,“我和沈(指茅盾)都被邀请作陪。第二天,毛泽民同志找我一人谈:‘恩来同志托我告诉你:你们可去延安。’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极大的安慰和振奋!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雁冰同志,他们全家也都十分高兴!此后我和雁冰同志就成日计划如何早日离开新疆,去延安”<sup>[10]45-46</sup>。

1939年的新疆,政治局势极其复杂微妙。一方面,在1933年一次政变中上台的新疆督办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曾一度采取亲苏联共的“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做出进步的姿态,抗日战争爆发后,希望中共派干部到新疆帮助工作,同意接受进入新疆的西路军指战员,并邀

<sup>①</sup> 参见苏生编《周恩来论抗战诸问题》,汉口群力书店1938年版。

请内地进步文化人士参与新疆建设等。但另一方面,盛世才在当政后竭力培植了一个严密的帮派势力,控制了新疆政府、军队、警察和情报部门的大权,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开始倒向蒋介石,在新疆排斥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sup>[2]507-509</sup>。1939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和新疆学院政治经济系主任、新疆文化协会副委员长张仲实带领学生暑期工作团赴伊犁进行抗战宣传和社会调查,引起了盛世才的嫉恨,诬说杜重远有野心,去伊犁是趁机网罗势力,并编造、炮制了一个“杜重远阴谋暴动案”,将之软禁、继之逮捕。张仲实、茅盾以及远在重庆的胡愈之、邹韬奋也被牵连。在1939年10月杜重远被迫辞去院长后,张仲实和茅盾也以文化协会工作多、忙不过来为由辞去了新疆学院的教职,从此割断了与新疆学院的一切联系。此间,盛世才先后逮捕了在新疆学院学习的杜重远的内弟侯某、杜重远的秘书孙某。11月间,盛世才又开始了一轮大逮捕。茅盾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到新疆后第一次见到盛随便大批抓人。当时常见面的几个少数民族的头面人物突然不见了,……后来从孟一鸣(中共从延安派去的新疆教育厅厅长——笔者注)那里知道他们都被捕了。除了迪化,在其他地区也抓了不少人。”<sup>[11]315</sup>其中也包括茅盾、张仲实他们主办的新疆文化干部训练班的学员,这使张仲实和茅盾感到形势的险恶。

1940年1月,张仲实和茅盾同孟一鸣商量如何离开新疆,孟说盛世才对张仲实已有疑心,多次询问张仲实是怎么去苏联的,回国多久了,是不是共产党员。更为险恶的是,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张仲实在茅盾家里一起交谈杜重远当时所处险境,盛世才派副官突然要张仲实去督办公署,张仲实随即被带到一间厢房等了两个多小时后,盛世才拿来一份材料要张仲实修改,并为其久候表示歉意。张仲实用了十几分钟就看完材料,改了几个字,交副官送盛,盛方请张仲实回去。关于这一天的事情,张仲实和茅盾事后都一致认为,盛世才要张仲实修改材料完全是借口,实质是想借机把他抓起来。但后来又犹豫了,反复权衡两小时,才借口修改材料放了他。此事明确传达出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盛世才要对他们下手了。此时的张仲实深感“从盛世才的魔爪下脱身,绝非易事。”<sup>[12]</sup>1940年二三月间,张仲实家里来信说他的伯母去世,说他不回去就不下葬,他立即写了请假信连同家信交给盛世才,要求准假回家安葬伯母,盛世才口头答应但就是不给解决飞机票问题。不久,茅盾也接到上海电报,说母亲去世,茅盾也向盛世才请了假,说办完事就回新疆。终于,他们历经艰难曲折,才在毛泽民、徐梦秋(孟一鸣)等新疆党的负责人的安排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的帮助下,于5月5日搭乘一架从莫斯科飞往重庆的苏联交通飞机,离开迪化到了哈密。据茅盾回忆录所载:在哈密的那一夜,哈密的行政长“刘西屏先后接到了盛世才的三次电话。……午夜三点左右,他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说:‘算了,让他们走吧!’”刘西屏是从延安派到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第二天清早,他怕盛世才反悔,早早送他们一行去了机场<sup>[11]337</sup>。茅盾认为,当着苏联人的面,盛世才是不便再扣留他们的。因为茅盾、张仲实当时还担任中苏文化协会迪化分会正、副会长,并与苏联领事馆有密切往来。6日他们终于到达兰州。之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乘汽车到了西安。在张仲实和茅盾离开新疆后,盛世才进一步撕下伪装,开始了大肆逮捕、迫害革命人士,比他们晚走一步的毛泽民、陈潭秋、杜重远等,都惨遭杀害。

## 六、周恩来安排张仲实和茅盾随朱总司令车队到延安

1940年5月19日,张仲实与茅盾一家从兰州经5天艰辛旅程到达西安。据张仲实回忆,他们到达兰州时,曾到八路军办事处找了负责人谢觉哉和伍修权,说了他们去延安的意图,请他们帮助安排。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他们见到负责人伍云甫时,伍高兴地说:“我们已经接到兰州的通知,我们已经安排好了,这一两天朱总司令要回延安,你们就随他走吧。”<sup>[10]46-47</sup>关于在西安去八路军办事处,茅盾在回忆录里有更详尽的描叙:到西安的次日下午,“我和仲实就来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客厅里意外地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恩来详细询问了我们离开新疆的经过,又问杜重远的情况。我们提出要设法营救杜重远。他说,三月间他经过迪化回延安时,曾向盛世才提出让杜重远搭他的飞机回内地治病,盛世才没有同意,推托飞机已经满员,说是让杜搭下一班便机走;现在你们回来了,杜先生仍未走成,可见盛世才不想让他回内地。这事只好慢慢再想办法。恩来又问我们今后有何打算,我们说想去延安。恩来当即表示欢迎且说,你们不论是去参观还是去工作,我们都欢迎。正巧有个好机会,总司令过

几天要回延安,你们可以同他一道走,这样路上的安全也有了保证。”<sup>[11]348-349</sup>在交谈中,张仲实和茅盾还请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讲了抗战的形势。交谈结束后,张仲实和茅盾了解了去延安的准备,为缩小目标,张仲实于21日先搬到办事处,茅盾一家则到23日晚再搬去。从中清晰可见,是周恩来副主席安排他们随朱总司令一同去的延安。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时,由于国共关系的日益复杂,去延安已不像前两年那样容易,因此对去延安的人员,不得不采取分批护送的办法。凡去延安的青年一律换上军装,由办事处派人用汽车护送。即使这样,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半路截留卡车的事件仍发生过多次。当然,张仲实和茅盾此次搭乘朱总司令的车队去延安,路途的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车队是5月24日从西安出发的,途中经过铜川、黄陵、富县等地,于26日午后顺利到达延安。到延安的当天傍晚,张仲实和茅盾还参加了延安各界在南门外操场举行的欢迎会,在朱总司令讲话后,张仲实和茅盾也相继发表讲话。次日晚,延安各界又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欢迎朱总司令、康克清及张仲实和茅盾两人,吴玉章致欢迎词,朱总司令、茅盾、张仲实及康克清相继讲话。毛泽东主席出席了欢迎晚会,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并一起坐在木凳上观看了鲁艺师生的演出。毛主席曾在繁忙的工作中两次到延安南关招待所看望张仲实和茅盾,并托人给他们送去《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两部著作<sup>[13]</sup>。

到了延安,张仲实“深深感到党领导之下的边区与国统区真是有天渊之别,由衷地感到一种回到自己家里的幸福感和安全感。”<sup>[12]</sup>党中央对张仲实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和高度重视,不久他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出版工作并兼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党的宣传思想和理论研究工作。

## 七、周恩来指定张仲实具体负责延安纪念和追悼邹韬奋先生筹备工作

1944年7月24日,我国著名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邹韬奋因病在上海逝世。因当时上海局势所限,有关邹先生逝世的消息一时不便发布。直到当年10月,新华社才在延安公布了韬奋逝世的噩耗。党中央决定在延安举行隆重的纪念和追悼活动,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指定张仲实负责具体工作。后来,张仲实在纪念周恩来同志的文章中写道:“周恩来同志要我为党中央草拟致韬奋同志家属的唁电。我拟毕送给周恩来同志,他圈点勾画,仔细批阅,这足见他对韬奋同志逝世的莫大痛惜。……周恩来同志指定我负责治丧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并要求我事无巨细,均需向他汇报。他不但亲自圈定周恩来、吴玉章、博古、邓颖超、周扬、艾思奇、柳湜、张宗麟、姜君辰、林默涵、李文、陈今吾和我等13人为治丧委员会成员,还召集筹备会议,亲自修改悼词,送毛泽东同志审阅。”<sup>[8]</sup>

据经周恩来阅转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张仲实根据记录整理拟写的《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原件(见图2),以上张仲实所列周恩来、吴玉章、张仲实等13人,实为11月11日韬奋先生追悼会发起人第一次会议到会者,并非治丧委员会成员,延安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活动成立有筹委会。按当时参与延安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活的李文先生回忆:10月10日之前,周恩来和陈毅就曾邀集周扬、张仲实、柳湜、李文一起开会商讨召开延安各界追悼韬奋先生大会筹备事项,商定筹委会委员由柳湜、周扬、艾思奇、张宗麟、张仲实、林默涵、李文组成,柳湜、周扬为正、副主席,张仲实为秘书长。11月11日,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了韬奋先生追悼会发起人第一次会议,讨论形成了由张仲实记录整理的《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sup>①</sup>。

对于张仲实记录整理的《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周恩来认真阅读并对之做了重要补充和批示。其重要补充有三处:在第二条“在全国发起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运动”前加了“电渝商量”四字。在第三条“向陕甘宁边区文教会议提议电唁韬奋先生家属,并在大会上介绍先生生平”后,增加了“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一句。在第四条“在延安纪念和追悼办法”之第四点“制追悼歌”后,增加了“由周扬负责”一句。批示为:“我们在昨天集会上,到了十多个人,定出如上的办法。关于全国性的,已电

<sup>①</sup> 参见李文《延安各界悼念邹韬奋先生纪实》,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老同志联谊会《联谊通讯》第16期,1990年11月15日。

林、董转商沈老,关于在延安要做的,正在筹备中。你们有何增改的指示也请告知。周恩来十.十二。”该《办法》经周恩来副主席修改审批后转请毛泽东主席审批,毛主席批示:“照此办理。毛泽东十月十六日”。由于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周副主席的直接主持,延安纪念和追悼邹韬奋先生的活动按此办法进行得十分顺利。11月22日上午,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以及群众整队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参加邹韬奋先生追悼大会并参观了韬奋先生著作陈列室,下午隆重举行了韬奋先生追悼大会,朱总司令、陈毅、吴玉章等两千多人出席。吴玉章主祭,柳湜报告韬奋先生生平事略,朱德、吴玉章、陈毅及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讲话,韬奋先生胞弟邹恩恂代表家属致答谢词;张仲实代表筹委会讲话,并宣布周恩来、吴玉章、林伯渠、博古、陈毅、续范亭、杨秀峰、成仿吾、贾拓夫、柳湜、周扬、艾思奇、丁玲、张宗麟、林默涵、李文、张仲实等为邹韬奋纪念委员会委员。大会最后一致通过了致韬奋先生家属的唁电。当天出版的《解放日报》刊发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等的题词,并发表了吴玉章、陈毅、凯丰、徐特立、萧三、艾思奇、沈钧儒、茅盾等的多篇纪念文章。张仲实则整版发表了题为《一个优秀的中国人——邹韬奋先生的生平及其思想和事业》的长文。周恩来因11月10日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2月7日才回到延安,故未能出席在延安举行的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的追悼大会。1949年,周恩来在邹韬奋逝世五周年时题词:“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深切表达了对邹韬奋先生一生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高度评价和真挚思念。

## 八、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复信张仲实家人告知平安

1940年5月,张仲实脱险新疆奔赴延安路过西安时,曾经给陕西陇县老家写过一封信,但长时间与老家中断联系,家中老小只知他离开了新疆而不知其去向,怕其有不测,一直心中极为不安。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谈,国内政治形势有所缓和。1946年秋,在陕西省陇县中学工作的侄子张维新从报纸上看到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便冒昧地给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询问叔父张仲实的下落。时隔不久,即收到了周恩来的亲笔回信。信是毛笔竖行写的:“来信收悉。令尊大人已在延安。如有信,可寄我处代转。”落款为“周恩来”。一封简短的信,使家人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得知亲人平安,都欣慰异常。全家人对周恩来这位著名人物的关怀感激不尽,以至长时间把周恩来信中的话铭记在心,至今虽原件佚失,但却能将信的全部字句熟背出来<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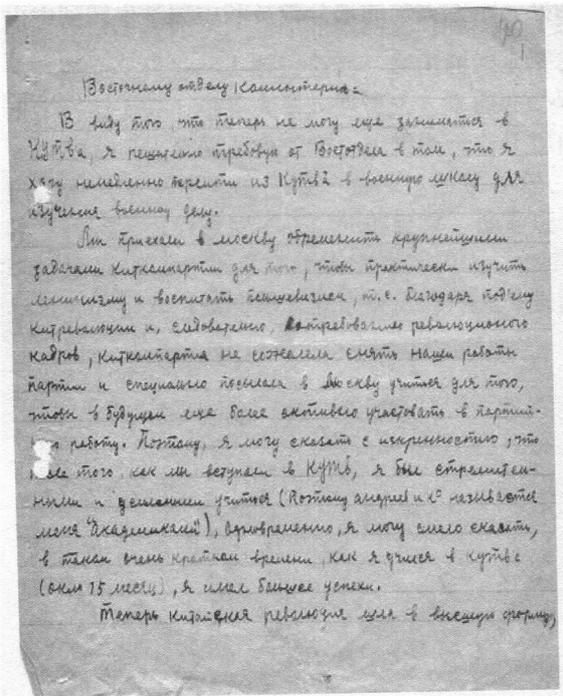


图1 张仲实用俄文写的向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转学军事的信原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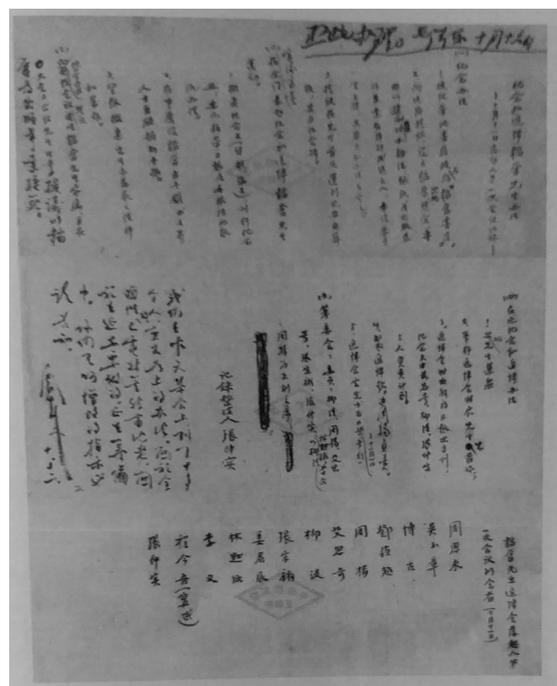


图2 张仲实拟定的延安《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原件

关于给周恩来副主席写信,张仲实之侄张维新曾在《我的叔父张仲实》一文里有过描述,周副主席的复信是寄到陕西省陇县供销联社转交他的。张维新生于1923年,其名字由张仲实所起。20世纪40年代中期毕业于西安西北会计职业学校,1946年后在陕西省立陇县中学、岐山县中学等校担任过会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陇县人民银行、县委政策研究室、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及工厂、企业工作,担任基层领导。由于他是家中最早在县上参加工作的人,张仲实与老家的联系,主要由他包揽,他也是其老家知道张仲实情况最多的人<sup>[15]</sup>。

## 九、受周恩来邀请张仲实出席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有关问题座谈会

1959年9月1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给张仲实送来了周恩来署名的通知:“张仲实同志:定于九月二日(星期三)上午九时在养蜂夹道一号(北海西侧)开座谈会,座谈八中全会有关问题,请准时出席。周恩来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此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红字信笺打印,信封以毛笔字写明:“即送中央编译局张仲实同志”,落款为红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见图3)。



图3 周恩来邀请张仲实出席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有关问题座谈会的通知原件

关于此次座谈会,是否由国务院主办,会议由谁主持,出席座谈会的人员有哪些,主要座谈讨论了有关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什么问题,会议取得了什么成果,等等,笔者曾查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年谱》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等权威著作,均未提及。我们认为以国务院总理名义邀请所召开的座谈会,肯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而对于周恩来研究来说这也应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史实,但不知何故却未在《周恩来年谱》中有所反映,建议有关党史研究部门通过国家档案馆对此再作进一步查考,以查清事实并及时补入《周恩来年谱》等相关著作。

## 十、张仲实撰文《言犹在耳,记忆仍新——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片段》纪念周恩来

1984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8周年忌日,张仲实撰写了《言犹在耳,记忆仍新——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片段》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以周恩来与知识分子关系为视角,以深深的思念之情回忆了周恩来关心和爱护救国会领导人、生活书店创办者邹韬奋先生的一幕幕往事,以之了却他“多年的心愿”,寄托他“对周恩来同志兼及韬奋的怀念之情”。

张仲实在文中写道:“翻开《周恩来选集》下卷,随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一行行铅字的闪耀和跳动,周恩来同志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的一幕幕往事再度重现在眼前,对周恩来同志的思念之情油然倍添。”张仲实详尽叙写了1937—1938年间在武汉,他与党驻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委书记潘汉年以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博古、凯丰等的密切往来,并先后引荐邹韬奋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面见了董必武、周恩来,之后影响邹韬奋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邹韬奋不但视周恩来为他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当面向周恩来提出希望他指导生活书店的工作,使生活书店的工作得到了党的直接领导,而且他本人进而还向周恩来正式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对邹韬奋及其创办的生活书店的工作曾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4月下旬,周恩来在讲到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办报工作时,对夏衍说道:“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sup>[2]</sup><sup>461</sup>抗战期间,这份报纸影响很大,对宣传抗日、动员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仲实还在文中重点回忆了周恩来直接主持并安排他具体负责延安纪念和追悼邹韬奋先生活动筹备工作的详细情况,每每想起这件事情,他都从心底里对周恩来感激不尽。1947年7月,周恩来在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周年时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对此,张仲实深切认识到:“这既是对以邹韬奋同志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赞扬,又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和极大爱护。”<sup>[8]</sup>这一切都充分表达了周恩来对以邹韬奋为代表的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关心和爱护。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张仲实真切地写道:“现在,全国人民都在进行四化建设。《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 and 行为作斗争。’只要我们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就一定能‘坚决纠正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sup>[8]</sup>这是张仲实从周恩来一生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爱护人才的思想 and 实践中,也从自己一生在党的关心、教育、培养下成长、进步的经历中所得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综上所述,对张仲实与周恩来半个世纪以来的交往史实作较为全面的考查梳理,以为张仲实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发掘与周恩来生平思想有关的重要活动史实的新资料,以弥补周恩来研究史料方面的某些缺漏。比较而言,有关周恩来研究新资料的发见更弥足珍贵。概括起来,这些史实主要有:(1)1937年12月28日,生活书店总编辑、《抗战》三日刊的编委张仲实等三人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拜访了周恩来及中共长江局有关负责人,并在《抗战》三日刊发表了访谈稿《与周陈秦三位先生谈话记略》,适时宣传了我党抗日主张及对时局的看法。(2)1938年9月,张仲实引荐邹韬奋拜见了周恩来,至此使生活书店的工作直接得到了周恩来以及党组织的指导、关心和帮助,从而促成生活书店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的坚强文化堡垒<sup>[16]</sup>。(3)1938年,汉口群力出版社出版了苏生编《周恩来论抗战诸问题》一书,宣传了中共关于抗战的方针、政策及策略和周恩来关于抗战有关问题的思想观点。(4)1939年在新疆精心安排身处险境的茅盾和张仲实去延安,使两人幸运逃脱了盛世才之虎口。(5)在西安周密安排茅盾和张仲实随朱总司令车队去延安,保证了两人一路安全顺利。(6)1944年亲自主持延安纪念和追悼邹韬奋先生活动的筹备,为纪念和追悼活动顺利举行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7)1959年9月2日,在北京养蜂夹道1号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有关问题座谈会。关于上述七个方面的史实,笔者翻阅近年周恩来研究成果,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等重要著作,除在武汉面见邹韬奋、在延安筹备纪念和追悼邹韬奋先生中有简略文字外,大多未见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应引起中共党史研究的学人注意。

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人物的研究,其根本目的在于探寻、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阐释、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要达到此一目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掌握真实、可靠、翔实的史料。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深感,无论张仲实研究还是周恩来研究,目前在史实的发掘、探寻方面尚存在不小的空间,需要再作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更好地打牢史料—史实的基础。这一点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之一,冀望与大家共勉。

#### 参考文献:

- [1] 张仲实.与周陈秦三位先生谈话记略[J].抗战(三日刊),1937(32).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3] 师哲口述,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 [4] 张复.去俄罗斯查寻父亲留学苏联的档案[M]//仲实:张仲实画传、纪念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238-239.
- [5] 张仲实.留苏笔记[M]//张仲实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8-14.
- [6]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底决议案[M]//六大以来(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3.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48.
- [8] 张仲实.言犹在耳,记忆仍新——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片断[J].人民日报,1985-01-08(03).
- [9] 张仲实.国际现势读本[M]//张仲实文集:第2卷(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 [10] 张仲实.我的经历[M]//张积玉,王钜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11]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12] 张仲实.难忘的往事——与茅盾同志辗转新疆的前前后后[J].人民日报,1981-05-16(05).
- [13] 张积玉.张仲实与毛泽东交往若干史实考略[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 [14] 张积玉.抗战时期张仲实与周恩来往来若干史实[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1).
- [15] 张维新.我的叔父张仲实[J].关山,2021(1).
- [16] 胡永欽,狄睿勤,袁延恒.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M]//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11.

[责任编辑 王银娥]

## Factual Research on Zhang Zhongshi's Contact with Zhou Enlai

ZHANG Ji-y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Zhang Zhongshi, a famous Marxist theorist and translator, has been in contact with Zhou Enlai, an outstanding leader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During these years, whether it was the time when Zhang Zhongshi was listening to Zhou Enlai conveying the report to the 6th Party Congress during his overseas study in Moscow, or it was the time when Zhang Zhongshi was visiting Zhou Enlai at the Eighth Route Army Office in Wuha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hile introducing Zou Taofen to Zhou Enlai and quoting Zhou Enlai's analysi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his monograph; whether it was the time when Zhou Enlai carefully arranged for Zhang Zhongshi and Mao Dun to escape from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Xinjiang for short) and went to Yan'an with Commander-in-Chief Zhu De's troops, or it was the time when Zhou Enlai personally presided over and arranged for Zhang Zhongshi to take charge of the preparations for commemorating and mourning for Mr. Zou Taofen, and Zhou Enlai wrote back to Zhang Zhongshi's family regardless of his full schedule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Zhou Enlai invited Zhang Zhongshi to participate in the symposium on the relevant issues of the Eigh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c., all have vividly reflected Zhou Enlai's sincere concern, enthusiastic help, active promotion of a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progress and revolutionary course as well as the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accordingly having reflected the CPC's fine tradition of respecting knowledge, valuing intellectuals and caring for talents in the century-long struggle of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in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Zhang Zhongshi; Zhou Enlai; factual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